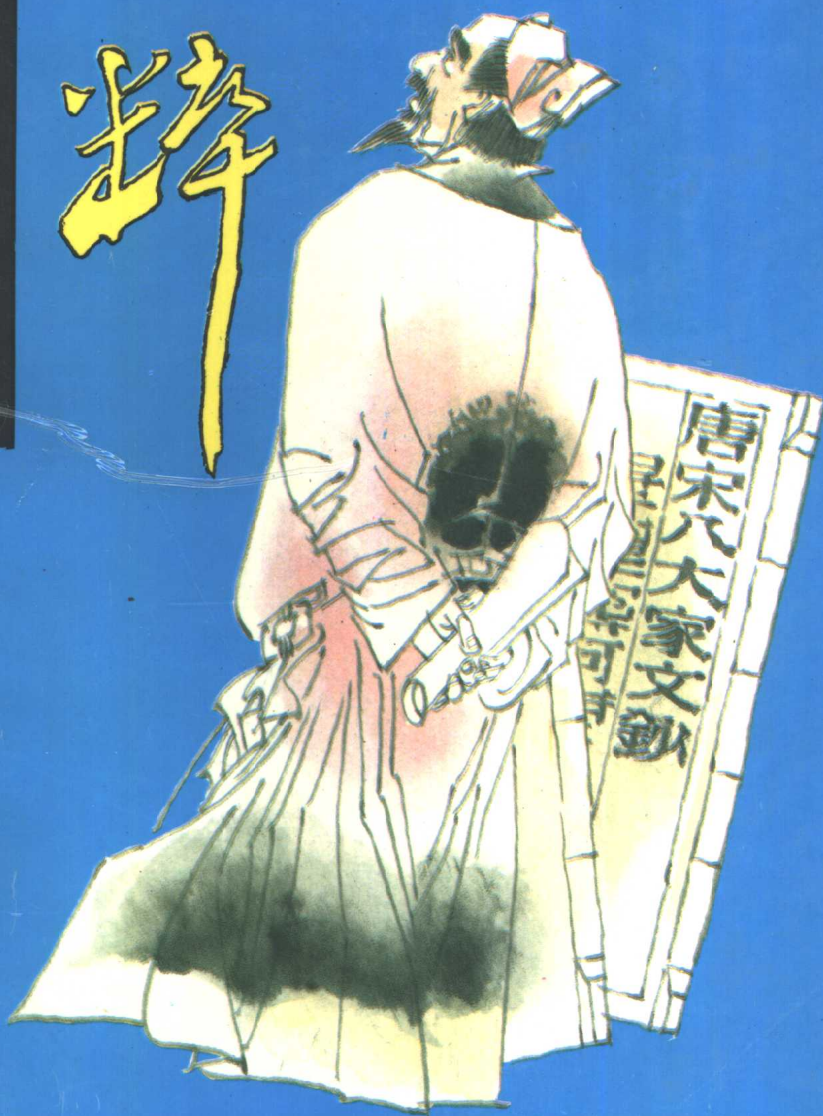


中国
古典文学
四大名粹

文粹



55254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I213.1
2
1
2

文粹

上

选 译

温洪隆(先秦、两汉)

谢楚发(魏晋南北朝)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文粹

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选 译
黄清泉 朱宗尧
(唐代至近代)

I213.1
2
12

55257

鄂新登字 05 号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文 粹

(上·下册)

选译:温洪隆(先秦两汉)

谢楚发(魏晋南北朝)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 603 页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10 插页 100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8000

ISBN 7-5354-1069-3

I·877 定价(上·下册):38.00 元

(“四粹”全套 8 册 定价:16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选收古典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戏曲中的精粹之作。与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比并，堪称辉煌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星云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两大星系。

“四大名粹”中的《诗粹》，收诗、词、曲一千首，《文粹》收散文二百六十篇，《小说粹》收文言、白话短篇小说一百五十篇，《戏曲粹》收杂剧、戏文、传奇十六部。除少数散文篇章系节选外，其他均为全录。

“四大名粹”的编选工作得到了全国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和古典文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全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季思先生亲自参与并指导了《西厢记》注释和评析的编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仔细审改了《牡丹亭》、《长生殿》注析的全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郭汉城先生、研究员沈达人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郭豫衡先生于百忙中分别应邀为《戏曲粹》和《文粹》撰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前言。在此，谨向以上各位先生以及“四大名粹”选注、翻译和评析的全体编撰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人选作品——经典性

注析文字——学术性

编撰人员——权威性

珍藏价值——永久性

这就是编辑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的追求。

前 言

郭预衡

中国古代散文，有传统的艺术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艺术特点。

首先从春秋、战国说起。

春秋、战国是中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王夫之曾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这是因为从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当时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文化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影响了散文的异常发达。

从春秋开始，由于士阶层的兴起、官师之学废弛，出现了私人讲学的现象。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私人著书的风气。一些讲学、游学之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著书

立说，于是产生了诸子百家之文。有些久已流传的虞、夏、商、周之书，也多半写定于这个时代。这时的文章，大体可分两类，一为诸子之文，一为史家之文。两类文章都有时代特点。主要特点，是放言无惮。

以儒家之文而言，《论语》一书，坐而论道，已经无所不谈。到了《孟子》，就更抵掌而谈、无所顾忌。其中许多言论，都是很大胆的。例如《尽心下》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干旱水溢，则变置社稷。”

先民后君、民为邦本的思想，可能不自《孟子》开始，但“民为贵”，“君为轻”，则是新的提法。孟子在“诸侯卿相，皆争养士”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当代的某些人君，并不放在眼里，不仅说过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而且曾说：“说大人，则藐之。”对于当时的各家各派，指责批评，也不留情面。因此之故，形成文章，便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或以为孟子“好辩”。对此，他曾有所辩解。《滕文公下》云：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文章之所以长于辩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再以道家之文而言，也是放言无惮。《老子》五千言，虽谈玄论道，亦多抨击现实。所以鲁迅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汉文学史纲要》）其愤辞之尤著者如：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又如：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又如：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这是相当激烈的政治评论和社会批评。其中说到平民百姓之所以饥饿，由于上面的统治者苛捐杂税之多，话说得相当尖锐，揭露得相当深刻。

《庄子》之文，虽“大抵寓言”，“空言无事实”，又“不遽是非”，“外死生”，“无终始”；但是，此书之文也和《老子》一样，亦“时有愤辞”。例如《胠箧》评论当时的社会现状曾有如下的言论：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这也是非常激烈的社会批评。这比《老子》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更为愤激。

但《庄子》之文，又“洸洋自恣”，“仪态万方”，度越晚周诸子。且以世人不可与庄语，故多以寓言出之。其辞采之富，非同时诸子所及。《逍遥游》、《齐物论》，皆千古奇文。

墨家之书，语多淳厚，但时当乱世，亦有放诞之词。《墨子·尚贤上》云：

故古者圣主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这是针对贵族世袭政权而发的议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是贵族世袭的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的。但墨家当时提出这样的社会理想，是十分可贵的。

此外，《墨子》书中对于王公大人“亏夺民衣食之财”等等，还有很多批评。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家行文也很讲究辩论。其论证方法，有所谓“三表”。这在《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明鬼》等篇中都曾具体运用。

法家主张君主专制，是不允许诸子百家放言无惮的。这是见于《韩非子·五蠹》的。但韩非自己却也敢于放言。例如《备内》篇对于宫廷之中权势之争的揭露，写得相当随便。如云：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而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也。

韩非著《说难》，对于君主的“逆鳞”是不敢撻的，但为了维系君

权,对于王位权势之争,则剖析得如此露骨。这是后代文章所不敢写的。

也正因此之故,韩非之文,廉悍犀利。虽不尚文,而亦自有文采。

在九流十家中,更加放言无惮的是纵横家。《战国策》一书,虽后人所辑录,但有些纵横家的思想文风,尚可概见。例如《秦策一》写苏秦游说赵国之后,将说楚王,路过洛阳,受到家人迎接的一段: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这样的语言,表达了纵横家的新的观念,不加掩饰,反映了苏秦这类游士的真情实感。尽管苏秦说楚、路过洛阳,以及父母妻嫂郊迎等等细节,并不符合史实,但作为纵横家的言论,则甚真实。在“钱能通神”的社会上,“势位富贵”,不仅影响一般的交往关系,而且影响家人父子的骨肉关系。像这样赤裸裸的表露,在此后的文章里是比较少见的。

纵横家的文辞,大抵纵横捭阖,口无择言。有些游说之文,不但危言耸听,慷慨激昂,而且指陈利弊,披肝沥胆,所以刘向虽然对于纵横家言有所不满,却仍然认为:“亦可喜,皆可观。”

杂家之文《吕氏春秋》是比较平实的。但有时也放言无惮。故方孝孺《读吕氏春秋》说:“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诃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以罪。呜呼,然则

秦法犹宽也。”

诸子为文之比较平实者，还有《荀子》，但其《非十二子》，批评各家，也十分尖锐。只有《劝学》等篇，纯然学者之文。由此可见，同是战国之文，各家各派，还有各自的特点。

这时的史家之文，重在记事，但也记言。《国语》、《左传》所记春秋时代的辞令，语多委婉。这一点不同于诸子之文。但《国语》讲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左传》肯定“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已有庶人议政、处士横议的倾向。至于《战国策》中策士之言谈，乃大夫行人辞令的发展。尤有时代特点。

以上所说，是就这个历史阶段文章的主要特点而言。此外，这时的文章，“深于取象”、“深于比兴”，“未尝离事而言理”，也是一个重要特点。还有，这时的文章，散体与骈体，散文与韵语，尚不甚区分。诸子之文，常是韵散兼行、骈散并用。《老子》五千言，几乎半为韵语，半为散体。《荀子·劝学》，排比用韵，不胜枚举。其他如《庄子》、《韩非子》之文也往往如此。这时的文章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可能与作者的意图有关。鲁迅说：“协其音，偶其辞，使读者易于上口”（《汉文学史纲要》），或即原因之一。

此外，就史家之文而言，除了记言的辞令之美而外，记事之工，也有特点，例如《国语》记事之重因果，寓教训；《左传》之“言事相兼，繁省合理。”（《史通·载言》）都是很突出的。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于是“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开始实行文化专制，“秦世不文”，这对文章的发展变化有大影响。当时除了李斯的几篇刻石颂功之文和一些“杂赋”之外，几乎没有文章。

但秦朝二世而亡，天下又归分裂。当楚汉之际，又值王纲解纽，于是游学之风再起，诸子之学复兴，尤其是纵横之学，一时称盛。汉代初年的蒯通、邹阳、枚乘、徐乐、庄安、主父偃等，都是纵横之士，其文章之存者，多有战国纵横之风。例如贾谊、晁错，虽学杂管、申，而为文“疏直激切”，亦或纵横驰骋。只是这些作者，生当战国之后，久乱思治，出谋献策，与战国游士之朝秦暮楚者不同。枚乘之《七发》，有如“七说”，但最后归于“要言妙道”；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极游猎之盛，而最后也归之“君臣之节”、“贤圣之业”。这类赋体之文，虽受纵横影响，而义归于讽，又与纵横驰说不同。

汉代之文开始更大的变化，是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董仲舒的对策之文是其先例。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在董仲舒以后，有些儒生为文，大抵侈谈天人感应，进行儒学说教。这样的文章曾经适应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而能传世者甚少。

汉武帝虽然尊儒，但窦太后却崇黄老，有的地方政权，亦尚黄老之术。而且，直到宣帝之世，仍然“杂霸”为治，并未专用儒学。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儒学之外，其他各家，尤其是黄老之学，仍然流行。司马迁著《史记》，被视为“先黄老而后六经”，不是无缘无故。

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了前代文章敢说真话的传统的。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记》之后，史传之文敢说真话者甚少。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伯夷列传》、《游侠列传》、《酷吏列传》和《封禅书》、《平淮书》等。

《伯夷列传》有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

非邪？积仁累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悦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里主要是说：好人不得好报，而恶人却得善终。伯夷叔齐“积仁累行”而饿死，颜渊好学而“糟糠不厌”，“屡空”而“早夭”。反之，盗跖“暴戾恣睢”而“竟以寿终”。还有当代的坏人，累世富厚，好人则遭遇灾祸，则古人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如何解释？司马迁对于这种天道之不公，人世之不平，是非常愤慨的。

由于如此愤慨，司马迁便对游侠之士十分赞赏，他在《游侠列传》中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又说：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飡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蹀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在当代统治者看来，游侠是“不轨于正义”的，但是，人世间之所谓“正义”，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有权有势，就有仁有义。谁

享其利，谁就歌颂其德。在司马迁看来，游侠能“赴士之困阨”，“有足多者”。

司马迁这样的是非标准，和当代的统治者大不相同。所谓“是非颇谬于圣人”者，此其一例。

司马迁赞美游侠的同时，便批评酷吏，实际上也即是批评汉武帝的酷吏统治。《酷吏列传》引《老子》的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对于武帝的现行政策，颇不谓然。

汉明帝曾对班固说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酷吏列传》恐即其例。

司马迁“贬损当世”，主要是刺讥武帝，贬损当朝天子。《封禅书》亦是显例。此书不讲封禅之典礼，而写方士之骗局。写武帝享尽人间富贵，又妄想长生不死。写方士“李少君病死”，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李少翁以“伪书”行骗，亦诛而“隐之”。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尽管班彪班固对《史记》之“是非”有所批评，但不能否认其为“实录”。

《史记》为世人传诵的名篇，还有《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货殖列传》等。在有的传记如《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里，都寄寓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在《项羽本纪》和《魏其侯列传》里，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至于“寓论断于叙事”，则所在多有，不胜枚举。

《史记》之外，汉代的史传之文，成就卓著者，是班固的《汉书》。刘知几《史通·六家》说班固“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缜密。”但《史通·书事》又引傅玄之说，谓《汉书》

“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数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现在看来，《汉书》之文异于《史记》者，主要在于不太敢于实录。这是因为班固著书，曾受明帝的指示。明帝曾明确指出：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不是“谊士”。班固撰《典引》，曾明言之。因此，《汉书》之文，主要是遵循当朝的统治思想，即董仲舒以来的儒学思想。对于大汉王朝是尽情歌颂的。《霍光传》、《苏武传》中对于忠于大汉王朝的人物是写得很有特点的。当然，《汉书》中对于某些特立独行的人物如杨王孙等，也有所肯定，对于某些社会风气如厚葬之类，也有所批判。《汉书》的文章虽不及《史记》之有先秦遗风，但典雅凝练，也有新的特点。

东汉文章更有特点者，是王充的《论衡》。《论衡》一书，对于当代的“伪书俗文”，“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论衡·对作》）。对于董仲舒以来的神学迷信和光武帝以来的神学统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其中《问孔》、《刺孟》诸篇，对于汉儒之神化儒学，多所驳辩。刘熙载《艺概·文概》说他“独抒己见，思力绝人”。章太炎《检论·学变》说他“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王充行文又力求通俗，多用口语，这在当时，也是突出的特点。

东汉末年，文章变化不小。赋体之文从《子虚》、《上林》那样铺张扬厉的长篇，发展为张衡《归田赋》那样的短制，而且产生了赵壹的《刺世嫉邪赋》那样的讽刺小品。与此同时，政论之文出现了王符的《潜夫论》、荀悦的《申鉴》、仲长统的《昌言》和崔寔的《政论》等。这些人对于汉末政俗，多所抨击，指陈时弊，相当愤激。

汉魏之际，是文章变化更大的时期。

这时东汉王朝解体，思想统治松弛，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不复成为一尊，各种异端思想乘机而入。特别是建安时期，曹操当权，他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曾经首先改变旧的儒学理论，代之以新的观念。他曾几次下令“求贤”，公然提倡“惟才是举”，即使“不仁不孝”，也“勿有所遗”。如此一来，便打破了汉代以来的用人的传统。他写文章也很有特点，鲁迅说：“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作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这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文章发展变化，都有影响。魏晋南北朝的许多文章写得通脱、随便，是从曹操开始的。

曹操之子曹丕、曹植，所为文章，也都有新的时代特征。抒情写志，都能纵意而谈，有些书信之文，已似后代的抒情小品。

在曹氏父子的门下，当时还有几个文人，世称“建安七子”。他们也都能文。其中的孔融，年辈最长。为人为文，都很独特。他“以气为文”，无所忌憚。其《论盛孝章书》，意气极盛。他虽与王粲、陈琳等人同为“七子”，但无词臣门客的辞气。其文风与“文学侍从”的笔墨颇不相同。

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思想与建安时期又有不同，士风文风亦有变化。谈玄、吃药、饮酒，对于一代文章都有影响。有些文人，思想更为通脱，为人放荡不羁。阮籍虽然作官，而以酣饮为事。虽然口不臧否人物，而内心实多愤慨，所为《大人先生传》，一面讲“应变顺和，天地为家”，一面又讲“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并非“遗落世事”。嵇康为人，“旷迈不群”，所为文章，尤有特色。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不但写得通脱，而且恣肆。“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为世教所不容”的。其《太师箴》一文，对于君主政权的批判，更为尖